

邓小平的语言艺术(上)

◆ 李洪峰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也是伟大的文化巨人,是公认的语言大师。毛泽东诗词,横空出世,雄视千古;毛泽东书法,汪洋恣肆,大气磅礴;毛泽东文章,融汇古今,博大精深。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一些重大概念、重大提法、政治用语,主要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许多重要论述,也主要是毛泽东完成的。毛泽东语言的最大特点是摆事实、讲道理,立论准确,逻辑严谨,生动活泼,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也是具有成熟鲜明语言风格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简练、幽默、平实,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说话办事都干净利落。他长期养成的习惯,“开会不作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以至于“文化大革命”时中南海的造反派来抄家,竟连只字片纸也没有找到。极度失望的造反派悻悻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走在历史前面的邓小平,一向拥有少说多做、实在质朴、勇于担当的鲜明个性。

简练是他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晚年,孩子们曾经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三个字:



“跟着走。”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他的回答两个字:“吃苦。”谈起他和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历史,他的评价也是两个字:“合格。”1968年10月,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保留党籍,次年被下放到江西。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到北京,时隔六年多,毛泽东第一次召见他,问他:“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外宾问他第三次被打倒后的感受,他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忍耐。”

邓小平常常用最简练的语言,一语中的,讲清楚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亲切会见,就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中国政研会副会长、著名党建专家、历史文化学者李洪峰所著《战略家邓小平》一书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立足于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从战略思考、战略判断、战略设计、战略决策、战略领导等方面,对邓小平的战略家风采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战略家邓小平》的出版引起了史学界、理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本版摘录内容选自书中“邓小平语言艺术”一章部分。

在两位领导人含笑握手的一刹那,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竞相掀动快门,记录下这历史的伟大时刻。这时邓小平以他出众的外交智慧和语言表达艺术说:“这是两国人民在握手。”这九个字高度凝练,意蕴丰富,充分展现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气魄和正大庄严的形象。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对于“国际形势”的态度时,邓小平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段话连用了三个四字格短语,高度概括了我们对国际局势的态度。同样,他在《军队整顿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一是有点肿。……”“二是有点散。……”“三是有点骄。……”“四是有点奢。……”“五是有点惰。……”这种方法即古人所谓的“提纲挈领

法”。简明扼要,说理清晰,读来使人印象十分深刻。

翻开《邓小平文选》,斩钉截铁的论断,势如破竹的议论,痛快淋漓的表达,生动鲜活的语言,俯拾即是,不胜枚举。邓小平的著作,有宏篇巨制,但主体是字字珠玑的短小篇什。在邓小平的辞典里,“人民”的分量最重,“发展”的频率最高。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是邓小平思维逻辑的根本点,也是邓小平语言艺术的聚焦点。有人做过统计,在三卷《邓小平文选》中,1148页的正文,“发展”一词出现了1066次。尤其是第三卷,383页的正文中,竟有558次提到了“发展”。

邓小平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幽默。邓小平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历经磨难,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乐观主义者”。他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候

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使邓小平养成了幽默的性格和语言风格。

1957年1月12日,清华园里,万余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着邓小平来作报告。邓小平用缓慢而清晰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加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邓小平这番诙谐幽默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1962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时,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川的俗语:“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发展走上了健康的轨道,邓小平幽默的语言风格愈来愈强烈地流露出来。1979年访美时,到美国后的第一顿晚餐,是参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家宴。席间,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一个带刺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面对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微微一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闷与狂



王蒙

11.这是梦中的一次诀别

所以你从来拒绝世俗,同时从来不把酒色财气看在眼里,你不介生活的意,你不膜拜也不恐惧。你不拒绝黝黑的与白皙的女孩子,不用说,还有银行和超市,餐饮与足底按摩。醒过来你后悔了半晌,你为什么不曾在梦里请那个帮你取款的孩子吃一客冰激凌,然后给她介绍一首雪莱的或者杜牧的或者干脆是你写的诗。在梦里你仍然错过了慷慨与浪漫的一刻,你缺乏激情和活泛,缺乏公关意识公关习惯。活就活了。吃就吃了。好就好了。梦醒以后,一切遗憾已经难以弥补。

你还梦到了你童年时代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小小街巷。那条名不见经传,有时地图上都没有标上的胡同,自西向东,到了你那儿拐了个弯,向南再向东走了。你正好在拐弯处,你家的木门是向西的。一到夏天,它接受了太多的阳光照射,门变得刺目而且烧灼。它的红漆斑驳剥落,其实三个月前还重新油漆了一回,油漆的时候铲掉了老漆,洗刷了尘土木屑与岁月的痕迹,抹上刺鼻的腻子,包括黏结剂有机化合物、增稠剂、保水剂、防腐剂等,用防水布条塞进门缝,再刷上两遍紫红油漆。

仍然经不住风吹日晒,经不起岁月的毁灭的坚决与不离不弃。仍然没有停止皴裂剥落。

你因为青春的烦闷与躁动离开了这个虽然简陋,仍然有着砖花门楼的木门院落,离开了后院的古槐与前院的茅房,你太忙了,你太多地冷落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母亲、姐姐、邻居。这天深夜,你是深夜才赶到这里的。你疲惫不堪。你怀着歉疚开了这个寒碜的院子。你熟练地开了门,开了灯。你大吃一惊,你没有看到一个人、邻居、熟人。你闻到了自己的家的亲切熟悉贫穷的气息,有点老腌萝卜的味,也有陈旧的被褥的汗气。你找不到人,找不到自己的母亲与童年了。你很沉重。你哑然也黯然。

这是梦中的一次诀别,别了,过往的一切,还有其他并不像你人表现出来那样轻松

的故事。你不想告诉他人。把阳光晒给世界,把阴影咽到肚里,把幽默玩到舌尖上,把沉痛捏成花色。这才是真实的你。

尤其让你糊涂的是,不论睡去还是醒来,你始终记得你们家另外曾经在一个热闹的商业区的小胡同里临时租过两间朝阳的房屋。那两间房的位置比其他房屋略高一点,说明那里你们混得还可以。你与母亲、姐妹与弟弟住一间,你的姨姨与姥姥住另一间。姥姥常常把玉米窝头烤得焦黑了再吃,她说是为了克食。你只在那里住了一夜,你走了。因为赶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你为历史的飞跃而烧灼,因为你越来越希望自己具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因为你甚至于在家里也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悲壮庄严。在你的家庭里,一直是只有你有忙碌的日程表。你怎么那么讨厌,也很是可怜。这就叫作赶上了大时代,其余的一切都压缩到了最小最小,都显得渺小卑微,穷极无聊。巨人的时代没有给侏儒爬虫们留下地盘。唱战歌与赞歌厮杀猛进的时代,没有给金嗓子甜姐儿留出平台。

这是真有其事吗?是梦?是恍惚的臆想?是年年都在淡化,却仍然迷迷糊糊一堆的块垒。难以淡化的仍然是一个遗憾,你希望在高龄之年闹清自己的闹市小巷偶居记忆的现实性或超验性、虚幻性。

年龄,时间,流水。似真似幻,似梦似形,似亲身亲历,切肤切近,也似灯下波影、恍惚朦胧,似记得也似忘却,信则有,不信则无,忆则有,不忆则如想念的风吹起的想象的烟雾。

假设你们又见面了,你也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你,她也不是六十年前的她,院子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院落,街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街,记忆已经变形。已经别了,别了,另一个你,另一个她。这究竟算是找到了,抓住了,凿实了,还是遗失了,过往了,灭绝了呢?

不要期盼重逢,其实重逢就是失去,不要约定重游,重游其实就是归零。

有时候你会深入到记忆的黑水里,黑暗,幽光,昨日还声气相通,如今却相隔万重,有一点细细的音响,有一点微微的笑容,更多的是平静的忘却。最好的记忆原来是慢慢地闭上眼睛,回到童年,回到母亲怀里。有时候你会蓦然地一喜,你们破镜重圆,你们拉起了手,你重又得到了一个清澈期待的秋天。

3.从报人到教师

从1969年1月到1973年8月,《江西日报》是我在新闻路上继续学步前行的第二站,也可以说是我吃新闻饭的第二个“娘家”。在这里,凭借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我全身心投入,没日没夜地苦干,被报社誉称为“叫得应、打得响”的“全天候记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被从机动采访组调入言论组,从当记者主要采写重大新闻、典型报道,到做评论员主要撰写评论文章、编辑《读书》专版,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1969年8月,不到两年时间,我被报社党委破格提拔为言论组副组长,是编辑部最年轻的部室负责人。在《江西日报》的六年,我一直得到报社主要领导的关心和培养,曾多次跟随正、副总编辑参加重要会议,下基层搞专题调研。他们指导我采写重大典型、撰写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等,我从中受到多方面的教益。说句心里话,1973年8月,若不是为了照顾一位革命前辈家庭的特殊困难,我也不会同其子女对调回上海,报社也不会放我走。

对于我在江西开始放飞新闻理想期间的表现,《文汇报》高级记者黄俭在他采写的题为《在继承中开拓的人——记上海青年报总编辑丁法章》(见1987年第7期《中国记者》杂志)的长篇通讯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丁法章到了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60%的江西,先在赣中报,后到江西日报。在6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踽踽独行于那崎岖的山间小路,深入到那里的群众之中,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省80多个县,他就去了50多个。在那里,他总结了自己的一套采写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怪不得一位江西新闻界的朋友在谈到丁法章时这样对我说:‘是大地滋润了他的生命,净化了他的灵魂,使他坚强,使他成熟,使他充满对事业的豪情和必胜的欢愉。’”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江西初涉新闻工作的6年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自己的所谈所写,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但就自己所经受的锻炼而言,无论是对社会基

层的了解,对民情民意的把握,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培养,还是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实务方面所得到的收获和感悟,都是不容置疑的。

1973年8月,我在江西从事了近七年报纸工作以后,通过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教师的对调,重新回到了曾经六年寒窗苦读的母校,当了一名专业教师。从做记者到当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虽然都是同新闻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质和接触的对象毕竟不大一样。在这座高等学府里,我教书育人,度过了整整10个春秋。

说实在的,刚回到复旦新闻系的时候,面对从家门到校门的单调生活,我这个还不到33岁的青年,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因此,回到学校不多久,我就提出到《解放日报》进修的要求,这样可以重回快节奏的采编实践中去。在系领导征求我主讲什么课程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新闻采访和写作”。因为这门课实践性强,能够经常有机会带学生到

报社实习。然而,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驻新闻系领导“斗批改”的工宣队老师傅,以我在《江西日报》搞过言论工作为由,一定要我承担起开设“小评论”、“大批判文章”专题讲座的任务。这样,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熬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的结束。在给学生们讲授上述专题的同时,我还零星开设了一些采访与写作的课程,并有幸兼职过1975届和社来社去进修班的班主任,曾两次带学生到报社实习和搞农村调查,没有长期禁锢在高楼深院里。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加强报纸评论工作的指示精神,新闻系广大师生开展了教学改革的大讨论,普遍认为应尽快开设评论课程,努力创建独立的新闻评论学科,并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全系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断摸索、大胆实践、认真总结,1984年我撰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新闻评论学》,并作为新闻学基础教材之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公开出版。

我的新闻人生

丁法章